

“大国意识”下的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

雷慧英*

【摘要】 战后日本经济取得高速发展后,从80年代起就明显地暴露出“大国意识”,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台湾对日本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近年来,日本不断调整对台政策,明显提升日台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中国内政,影响中国统一进程。本文从这一角度切入分析日本“大国意识”抬头的原因和种种表现,指出日本对台政策调整的用心是要使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甚至用台湾问题来制约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大国意识”的抬头是十分值得中国人民警惕的。

【关键词】 大国意识 对台政策调整 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对台政策调整受到历史情结、国家战略、经济利益、国内政治、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和日本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在“政治大国”战略的驱动下,调整了对华、对台政策,开始违背《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郑重承诺,进一步密切与台湾的关系。本文拟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大国意识”抬头的角度切入,重点分析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一、日本“大国意识”的抬头

(一)日本“大国意识”抬头的原由

二战以后,日本在战败和被美军占领的特殊条件下,选择了“经济立国”的生存与发展的道路。经过10年分化改组,1955年形成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保革相争”为特征的“五五年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以吉田茂为代表的经济中心主义路线得以确立和巩固。这一体制维持了保守政权的长期稳定,使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增长,60年代末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80年代后,其国际地位、国内产业及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给日本政党政治带来了一系列危机。而这一系列变化和危机,对于日本战后追随美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路线提出了严重挑战。因此,日本长期被迫压在心底的“大国意识”,开始抬头,“政治大国”成了日本追求的战略目标。具体而言,日本“大国意识”抬头有以下方面原因:

1. 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需要。80年代,日本这个占世界陆地面积仅2.7%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一半,占世界经济的10%。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日本开始成为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在日美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经济摩擦。日本已发展成为有能力向美国说“不”的经济大国。从以美元计算的GNP(国民生产总值)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看,苏联解体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1992年日本与美国的GNP比值为1.16,相当于美国的62.5%。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987年就超过美国居第一位。从人均GNP看,1991年日本为27195.5美元,而美国为22468.5美元。1993年日本为23210美元,美国为20267美元。

随着国力的强大,日本不甘心只做偏安于东洋一隅的经济大国和政治、军事“侏儒”,自然要追求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80年代初期,日本正式提出了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争当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从那时起,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日趋明显,日益加速。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上任不久首次提出“政治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强调“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中曾根康弘在他80岁高龄之际又推出的《20世纪的日本国家战略》一书,全书围绕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教育等领域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战略主张,大有日本不实现“政治大国”就死不瞑目之意。1990年海部首相也继续提出“必须形成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努力摒弃“政治小国”形象,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建立政治大国的目标更趋于明朗。

2. 国际环境变化。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结束,前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亚太战略做出调整,把日本作为“美国重要的太平洋盟国和美国的亚太前沿防御战略的基石”。在这一背景下,美日军事同盟关系有所强化,矛头对准包括朝鲜和中国台海局势的所谓“周边事态”。日本的军事作用从提供基地,扩大到公海承担美军的后勤保障任务。日本试图借助日美安保同盟,牵制中国,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以利实现日本“政治大国梦”。

3. 政界保守势力抬头。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的新老交替,一部分具有强烈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新一代“实力派政治家”走上政治舞台,如桥本龙太郎、小泽一郎、小泉纯一郎等人。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后,力图尽快摆脱战败国的地位,要冲破战后的“和平宪法”、“非核政策”和“专守防卫”三大束缚,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希望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

4. 对美不满情绪逐渐增大。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美主日从”为特征的战后日美关系框架也开始发生变化。80年代以后,美国对日政策也从保护和扶持转为逼日本在共同防卫和对外援助等领域分担更多“负担”。另一方面,在双边经济关系上,美国开始限制日本的发展,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节节退让,但两国的经济摩擦仍然不断升级。因此,日本对美国的不满情绪逐步增大,这对日本决策层确立更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大国”战略构想也产生了推动作用。

(二) “大国意识”抬头的表现

日本民族历来争强好胜,总想跑在别国前面,其民族心理的深层积淀中充满了大国意识。基于上述的原因,近年来,日本政府想利用冷战结构解体的机会,彻底摆脱二战失败的阴影,依仗自己的经济优势,在世界上寻求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因此,90年代以来,日本一方面在国际上努力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旧“敌国条款”,还派兵到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另一方面在国内大造“政治大国”舆论,不仅自民党的领导人明目张胆地鼓吹修宪,连护宪派内也开始有人公开谈论修宪的必要性,“大国意识”抬头的表现十分明显,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

1. 坚持否认侵略历史的观点。日本战败后,不少人只承认是物质力量和科学技术的失败,不愿意反思和更正民族心理,战败只不过是把大国主义的种子深埋在了心底,一有机会就

会重新发芽。

从 80 年代以来担任日本首相的领导人多次有关二战的讲话看,表态的主流是否认战争侵略性,抵赖战争罪行。在亚洲各国的强烈谴责下,他们只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说出“遗憾”道歉”和“深刻反省”的老话和套话。而实际上,日本 1995 年的“不战决议”正文中不写“不战”,把“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写成“那些行为”。此外,多次发生教科书事件。无论日本是把“侵略”改写为“进入”,“太平洋战争”改写为“大东亚战争”,还是修改“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和删除“随军慰安妇”的内容,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坚持否认过去侵略历史的观点,否认侵略,逃避日本的“国家责任”,为军国主义日后翻案做好准备。

2. 增加军费投入,加强军事力量。70 年代以后,美国从亚洲收缩力量和世界能源危机的爆发,触动了日本长期以来经济中心主义路线下的安保观念,使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对过去完全依赖美国安全防卫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认识到能源威胁不亚于军事危险,因此,对“专守防卫”原则进行了调整,开始迅速增强军事力量,增加军费投入。日本军费占 GDP 的比例大约在 1%左右。由于日本 GDP 规模很大,占世界第二位,因此,日本军费的绝对额也“水涨船高”,不断增长,目前已占世界第二位。2000 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高达 484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所有军事预算费用。《日本 2001 - 2005 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规定,5 年的军费总额累计将达 25.16 万亿日元,年均 5 万亿日元以上。这一数额超过了东亚地区其他所有国家国防预算的总和。

战后经过半个多世纪,日本已经发展成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大国。目前,日本常规军事装备力量和潜在能力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同时,日本政府不断提高军事机构的规格,2001 年 12 月 1 日,日本参议院的一个超党派议员联盟正式提出议案,建议政府在 2002 年 1 月中央部改组时,将现有的防卫厅提升为国防省。2002 年 5 月 7 日,日本防卫厅发表的白皮书公开表明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同年 12 月 15 日,日本政府还决定在建立“有事法制”过程中,要强化首相的指挥权,当发生紧急事态时,首相可以在内阁决定之前直接下达调动自卫队、警察和地方政府人员的命令。显而易见,当前日本加强军力的直接目的是为其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服务。

3. 积极参与地区政治、安全事务。冷战后,日本一改以往的“小国外交”,争取在地区、国际问题上有发言权,同其他大国一起共建世界新秩序。从 1990 年开始,日本先后派代表出席北约和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倡导在东北亚安全对话,建议改革联合国,斡旋解决柬埔寨战后重建和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9·11”事件后,日本又积极出兵印度洋,配合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其实是借反恐怖之名,行扩张之实。在援助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无不充分说明日本急于把自己扮成有能力,有形象的“政治大国”。

4. 制定新法案,扩大军事活动空间。1992 年日本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打破了自卫队“专守防卫”的禁令。近两年来,又制定了“周边事态”、“有事法制”和“反恐特别措施”等法案,将自卫队的使命进一步融入美军全球战略之中。2003 年 5 月 20 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参议院有事法制特别委员会上答辩时说,日本的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周边事态”和“有事法案”涉及到我国海峡两岸的关系。因为日本担心中国的统一,会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制定新法案来牵制中国的统一,使海峡两岸维持现有的分离状态,也许这样对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更为有利吧。这样,在“政治大国”战略的驱动下,日本加强了与台湾的关系,主张:“若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介入保卫台湾,作为同盟国的日本也将对其支援”,并扬言日本已经迎来应该承认台湾是国家,支持台

湾加入联合国的时代。日本右翼势力代表石原慎太郎在台湾公然称台湾为“周边国家”，形容东京与台北是“首都”与“首都”的关系，公然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显然，在“大国意识”明显抬头的形势下，日本在中日关系、日台关系上必然会调整其政策，篇幅关系，下文只着重分析对台政策的调整。

二、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

90年代以来，日本确立了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基本方针，把亚太地区作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把从东北亚、东亚到东南亚的新月形地带作为亚太外交的战略重点。台湾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不仅属于新月形地带的关节点，而且属于日本泛1000海里海上防线的范围。日本自卫队研究人员认为，台湾稳定与否，对日本的防卫意义重大，日本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台湾问题。因此，近10年来，日本政府开始重新认识台湾存在的价值，从经贸交流、军事合作及组织高层交往等层面不断调整对台政策，企图以发展日台关系来牵制海峡两岸关系。具体做法如下：

（一）进一步密切经贸关系

日本认为，亚洲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对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极为重要，2001年小泉纯一郎出任新一届首相的“施政演说”中仍然强调“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同时加强日美欧三边合作，重视发展同亚太国家的关系。这是日本作为亚洲国家，其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上的需要。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已成为日本主要的投资和贸易对象。日本利用台湾的历史情结关系和出于上述战略的考虑，采取所谓的民间交流手段，不断扩大与台湾的贸易往来，使台湾成为日本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市场。

1972年日台“断交”时，双方的贸易总额为14亿美元，1985年为97亿美元，增长了7倍，1990年达243亿美元，1995年高达400.7亿美元，台湾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第四大贸易伙伴。1997年日本已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407亿美元，日本也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者，累计已达80亿美元。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深厚的关系，有的甚至堪称为日本的“影子企业”。^⑩近年来，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长，台湾市场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2001年日本是台湾第一大入超市场，台湾对日贸易赤字达130.9亿美元。^⑪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近百亿美元的顺差，使得日本企业界越来越重视台湾，呼吁扩大日台经济关系。日本对台湾经济渗透也日益加深，九大商社在台湾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如今台湾出口商品的20%以上掌握在日本商社手中，出口到日本的产品约有90%要通过日本商社进行。

（二）日台军事合作意向增强

冷战之后，日美进一步调整加强日美安全体制。特别是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日本行使武力的范围不断扩大，从“日本有事”转变为概念模糊的“日本周边有事”。此外，不时有日本政要叫嚣“日本周边”覆盖台湾海峡。最为典型的当属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他公然宣称“中国若武力犯台，日本不会坐视”。近年来，日本在东亚地区频频举行军事演习，防卫重心从北向西转移，防范针对中国的意向十分明显。2001年以来，日台双方一再发出加强军事合作的信号，首先是台湾当局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国外媒体、学者表示，为维护“台海和平，也为美日共同利益考虑，美日台必须密切合作”。8月19日，日本防卫研究所要员在旧金山大肆鼓吹只有协同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国军事力量才能防御大陆的攻击。日本防卫厅官员也曾表示，一旦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日本将依据“日美安全条约”对美军提供支援。另据台湾媒体报道，2001年6月20日，在台发射“爱国者”导弹之际，有一名日本主管情报

事务的现役少将应邀“列席”参观,显示日台军事交流由退役军官升格为现役将领。2003年,日本政府又派陆上自卫队退役少将长野阳一任驻台交流协会会长。这是自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第一位赴台湾长驻的有军方背景的日本人。

(三) 政治交往层次不断提升

90年代以来,日本不断提升日台双方交往层次:1. 允许副部长级以下官员以“私人身份”访台。日台高级官员经常以参加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或会议名义进行“政治外交”,1994年徐立德以参加广岛亚运会的名义访问日本,随后,桥本龙太郎作为日本通产大臣利用参加亚太经合会的机会,与台湾“经济部长”江炳坤进行了正式会谈。日台部长级官员在日本举行正式会谈,这在1972年日台“断交”后尚属首次。1995年,日本政府又利用协调台湾当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人选问题的机会,与台湾当局进行频繁的高层接触,其接触层次和涉及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人选问题本身,超出了1994年秋季在李登辉、徐立德访日问题上的协调规模和水平。2. 纵容日本亲台议员赴台“访问”。日本政界,亲台势力活动频繁,1997年成立了由4个政党的300多人参加的“日台关系议员恳谈会”,成为日本对台政策交往的主要渠道。自民党还成立了“自民党日台友好议员联盟”,民主党成立了日华友好议员联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两次公开访台,声称“为了台湾,将尽一切所能”。

日本为达到“强化对台湾的考虑与发言权”、“发展日本与台湾的交流”的目的,一些重要政党的议员频频访问台湾,2001年夏季,特别是8-9月,日本国会议员访台最为频繁。例如,7月,日本自民党众议员米田建三就到台湾与陈水扁大谈所谓“日台团结对抗中国”。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议员访台人数高达几十人,其中不乏自民党重量级人物。并呈现以下特点:(1)人员多。短短一个多月访台议员达到几十人。(2)范围广。访台议员不限执政党,还有不少属于在野党和无党派人士。(3)年轻议员多。2001年5月成立的“自民党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小林兴起,成员为年轻议员。据日本媒体透露,该“联盟”在李登辉访日问题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于7月初访台,7月2日陈水扁在台北会见了他们。主张台湾、美国和日本加强在亚太安全领域的合作。不久,该“联盟”一行10人又于8月23-25日访台,与台超党派议员联盟会谈后发表声明。(4)交流渠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8月20日,日本自民党、自由党及无党派议员24人参加了由民间团体“亚洲战略学会”在台北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就日台合作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2001年4月20日批准李登辉入境,为日后日台高层互访打开了一个缺口。在2002年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会议上,日本破例表示支持台湾加入WHO。

近年来,日台双方不断有人散播传闻:冲绳欲与台湾建立经济圈,台方欲与日本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日台要建立“安保对话机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社会的“台湾情结”对上述议员们影响很大,一些议员甚至认为台湾是“不在日本版图内的日本国土”,企图使台湾有朝一日再次从中国分离出来,“独立建国”乃至并入日本。这些动向十分值得关注。

三、对台政策调整的限度与中日关系

日本要确立什么样的中日关系,把中国放置于什么样的战略地位,对日本来说,是个新的课题。纵观30年来的中日关系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根据“政治大国”战略的需要,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加强与台湾的往来关系,为台湾维持现状或“独立”调整了对台政策,但是,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还是受到日本对中日关系战略定位的影响和限制。因为中国在亚洲的影

响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日本要保持和提高自己在亚洲的政治地位,首先应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所以,日本外务省次官林贞行在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月刊发表文章说:“我认为遏制中国不是上策。促进中国开放,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把中国接纳到国际社会中来,使其成为其中的一员,让其履行责任,我认为才是应采取的政策。”^⑪

冷战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既想通过发展中日关系借助中国的力量提高政治地位,但又想通过制衡中国的发展来实现它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一点从1991年8月海部首相在西方国家与中国因“北京风波”而全面对立之时访问中国,并提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新概念和调整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政策上看,十分明显。

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是跟随着美国,并企图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统一。但是,从日本对整个亚洲的外交政策看,它又不能忽视与中国改善关系。尽管近年来一直不断地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但应该说是在不使中日关系破裂的前提下进行的。就日本长远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来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所占的分量截然不同,孰轻孰重,日本政府一定会权衡利弊得失。

可以说,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对外战略格局中,日本仍然十分重视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认为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都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支柱。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曾把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形象地比作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但是这两个轮子分别行驶在不同的轨道上。一根是世界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一根是亚洲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在日本看来这两根轨道并行不悖,都可以把日本导向“世界政治大国”。日本要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与中国的关系如何有相当分量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是有限的,即便中国大陆对台湾行使武力统一,日本不会单独为了所谓台湾安全采用军事行动,介入中国统一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而破坏中日关系。

但是,如果美国军事干涉台湾事务或台湾局势时,日本就完全有可能借《日美安保条约》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之名,行干预台湾问题之实。这次的伊拉克战争,日本的行为正说明了这一点。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日本继续把台湾视为“生命线”。为牵制中国大陆的发展,日本一定会与美国一起把台湾作为制约中国的“王牌”,这就是中日关系和日台关系的微妙之处。同时也是我们制定对策时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注:

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65页、第71页。

参考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 统计篇》,1994年第1期。

参考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1994年第6期,第62页。

冯昭奎著:《日本:战略的贫困》,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月,第369页。

金熙德:《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2月,第38页。

参考刘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317页。

李伯军:《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台关系的演变与中日关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日本《军事研究》月刊1995年9月号。

王俊彦著:《战后日台关系秘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211页。

⑪ 韦弦:《日台关系暗流涌动》,《联合早报》2001年4月21日。

⑫ 参考《世界经济年鉴》2002年。

⑬ 梁云祥等:《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57页。